学术专论

清前期汉中八旗驻防考实

屈　成

[摘要] 汉中为川陕关隘，顺康两朝分别在征定西南途中、平定三藩之后，两度在此驻防八旗。后因战事结束、粮饷转运艰难、旗民矛盾以及防止满人汉化等原因而裁撤。雍乾时期，出于解决八旗生计的需要，清廷再度议设汉中驻防。但此时清廷开疆拓土的重点转移至西北，汉中的政治地理区位重要性相对下降，汉中驻防计划最终搁浅。汉中八旗驻防的驻撤过程，说明乾隆朝以前八旗驻防制度仍处于调适阶段，也表明清廷八旗驻防的重点开始由内地转移至边疆，反映了清廷统一全国过程中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变化。

[关键词] 汉中　八旗驻防　汉化　八旗生计　驻防格局　清前期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1）－04－0118－0016

八旗驻防是清廷入关后为控制、弹压地方，维护政权稳定而在省会重镇、军事要冲等地设立的军事驻防制度。现有研究内容上集中于制度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城市史、遗址考察等方面，硕果累累。但是，这些成果重视八旗驻防的中期变革与晚期裁革，对于驻防八旗早期状况则疏于考察。[①] 这种结果，一方面与清初八旗驻防的不稳定性有关，另一方面则因材料零散，故难以了解其驻防制度之初况。本文则以个案切入，对清初八旗驻防之筹建做一分析。

陕西乃控扼西南与西北之重地，而汉中战略地位更为关键。因此，清廷曾两度在此设置八旗驻防，至雍乾时期再两度议设驻防。学界现有研究对于汉中八旗驻防的史实注意者寥寥。即

[收稿日期] 2021-02-25

[作者简介] 屈成（1993—），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qchengqs@163.com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 2020 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① 主要代表性研究有，马协弟：《驻防八旗浅探》，《满族研究》1985 年第 2 期；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年；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年；任玉雪：《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 年第 3 期；黄圆晴：《清末八旗制度存废讨论——以（东京）〈大同报〉为中心的考察》，《军事政治学研究》2013 年第 3 期；刁书仁：《清代八旗驻防与东北社会变迁》，科学出版社，2018 年；张威：《清代直省驻防城对其所依附城市形态演变的作用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年；潘洪钢：《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19 年；朱永杰：《清代满城历史地理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刘小萌：《清朝遗迹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对清初驻防与地方关系的关注，参见王刚：《清初苏州八旗驻防探析》，《清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郑宁：《清初江南的八旗驻防与地方应对——以杭州满营建设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19 年第 3 期。后面两篇论文为本文撰写提供了一定借鉴与思考。

有注意者，也因史料收集有限，认知难免存在缺漏、含混与错讹。[①] 汉中八旗驻防两驻两撤与两度再议，其间驻防之细节、变化之背景、演化之脉络，均值得探究。本文以清代奏折、题本等档案以及官书、方志为史料基础，考证汉中八旗驻防之规制，钩沉驻防之原委及其与清初八旗驻防格局更移之关系。

一、清初征定西南与汉中八旗驻防

（一）西南局势与顺治朝汉中驻防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江南为南明政权占地，且为财赋蓄藏之所；陕西为"天下诸省之首，得秦则得天下"。[②] 因此，清廷东线派兵南下征定江南，西线逐步平定河南、山陕等地，进而由陕入蜀征定西南。顺治元年，多铎、阿济格率领南北两路大军进军西安，征定陕西。[③] 汉中时为贺珍等占地，见清军入驻陕西、李自成南逃，贺珍归顺，[④] 被授汉中总兵。[⑤]

秦省粗定，而巴蜀未靖。欲征定四川又必以稳守汉中为先，所谓汉中"关川陕之安危，立国于南北者所必争也"。[⑥] 清廷当即决议在西安、汉中设置驻防，并招抚流民，以备进军四川。顺治二年六月，清廷"遣内大臣何洛会统领官兵，驻防西安"，是为西安驻防之始。而汉中驻防则几经波折。总督孟乔芳疏言："四川献贼尚在肆逆，则兴安、汉中一带实为冲要，非驻重兵恐不足以资防御，而张挞伐。"[⑦] 然则，顺治二年底贺珍反清，"汉中叛"。[⑧] 其后，贺珍联通"孙守法、胡向化，率马步兵七万余犯西安"。[⑨] 汉中、西安告急，驻防计划破产。顺治三年正月，肃王豪格率大军出征川陕，同年五月初五日，豪格命多罗贝勒尼堪等，率兵由栈道进定汉兴。[⑩] 其后，豪格大军趁势夺取四川。顺治四年底，豪格以四川平定而返京。[⑪]

豪格平定川陕回至北京后，西南与全国局势再变。为应对西南局势，顺治五年清廷正式在汉中派驻八旗。凡变者三：

其一，豪格大军一撤，盘踞川省内部的南明政权、前明宗藩、地方农民军各大势力纷纷起兵，清廷一退再退，退回保宁驻守。征定版图再失，因此不得不派重兵驻扎汉中，以备进军四川。[⑫]

其二，顺治三年，孙可望等大西军余部退据云贵培养势力，为清廷大患。至顺治四年，清廷东线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相继征定弘光朝廷、潞王监国、鲁王监国以及隆武政权。广东永历

---

① 目力所及，注意到汉中驻防并有较多论述的有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一书与陈跃《清代陕甘地区八旗驻防研究》一文（白文煜主编：《民族融合与发展——纪念八旗制度创建4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100–115页）。受制于史料情况，两者皆有错讹含混之处，详见后文。

② 孟乔芳：《孟忠毅公奏议》，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19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③ 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7《纪平定江南事》，《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82页。《清世祖实录》卷10，顺治元年十月癸酉；卷14，顺治二年二月辛酉。

④ 《陕西总督孟乔芳启》，顺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员工福利委员会，1972年，第103页上。

⑤ 《总兵官贺珍揭帖》，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第133页。

⑥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6《陕西五·汉中府》，中华书局，2020年，第5册，第2672页。

⑦ 《清世祖实录》卷17，顺治二年六月辛未；卷19，顺治二年七月戊午。

⑧ 《陕西宁夏总兵刘芳名揭帖》，顺治三年正月十九日，《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526页上。

⑨ 《清世祖实录》卷23，顺治三年正月辛酉；顺治三年正月己巳。

⑩ 《清世祖实录》卷28，顺治三年九月壬子。

⑪ 顺治四年底豪格率军返，至五年正月返京。参见《清世祖实录》卷36，顺治五年正月癸亥。

⑫ 相关反清势力战况可参看顾诚：《南明史》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449–452页。

朝廷则遁逃广西。顺治五年，清廷再度派兵南下，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顺王为主力南下征讨广西。西线战略部署自然也是提上议程，因此满汉大兵不断云集汉中。

其三，贺珍等部反叛与清廷的应对。贺珍叛清前即与大顺军余部及陕甘各地农民军取得联系，自叛清始，陕甘各地风靡云涌，一时固原、凤翔、秦州、灵州各地皆与响应。[①] 如此重大叛乱势必引起清廷重视，增强汉南军事布防。总督孟乔芳即以“汉中、兴安接壤川湖，当水陆之冲，最为要地”，以及招抚流民为由，拟于汉中移设巡抚，增强汉中、兴安军事布防。[②] 派驻八旗驻防，自然也是其中要着。正如时人所谓：“新朝奠鼎，平西开府，定西并镇，雄师骁骑，既星屯而云拥矣……奉指扮守要害，声焰所及，莫不耸訾，四境安于覆盂，而汉民享无事之福。”[③]

此次驻防异于西安、江宁等地，清廷不仅派驻八旗，亦派吴三桂所部共同驻防。顺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清廷命“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为定西将军，率右翼汉军官兵驻防汉中”。[④] 次日，清廷又命平西王吴三桂自锦州移藩开府，赴汉中戍守。[⑤] 李国翰所领右翼旗军和吴三桂部队为常川驻防，是为汉中八旗驻防之始，亦为有清历史上藩旗经制同镇之特例。

（二）汉中驻防规制及其裁撤

顺治朝汉中驻防规制，除前文所述《清世祖实录》等片语只言外，难有相关详实记载。这也导致部分学者并未察觉顺治年间汉中确有八旗驻防，即便有注意者也以其为临时驻扎而非经制驻防。[⑥] 故须对顺治朝汉中驻防规制作一阐释，以明制度。

李国翰与吴三桂进军汉中为常川驻防，所谓“平西开府，定西并镇”，[⑦] 即是吴三桂与李国翰在汉中城内各立府衙。据考证，吴三桂直系亲属住在汉中城关的西半部分，亲军住在关厢内，新兵住在关厢外。而所属其他兵丁及其家口，分驻在汉中城周围四城。[⑧] 顺治《汉中府志》卷2《城池》有“汉中府南郑县图”，明确绘制了当时吴三桂府衙位置，在城西部、汉中卫衙署东部，称“王府”。同样，在该图中也可以发现，固山额真李国翰衙署在汉中卫署西，南郑县衙东南，称“固山府”。[⑨]

固山额真、侯、定西将军李国翰，镶蓝旗汉军人，崇德四年（1639）编设汉军四旗时即任蓝旗梅勒章京，崇德七年编设八旗时为镶蓝旗固山额真。[⑩] 顺治五年四月，清廷命李国翰为定西将军，“率右翼汉军官兵驻防汉中”。[⑪] 可知当时驻防汉中的全为八旗汉军。所谓右翼，即八旗右翼的正黄、正红、镶红和镶蓝四旗。这既符合顺治《汉中府志》的记载（参见表1），也与《钦定八旗通志》记载的相关驻防汉中人员的旗分一致。[⑫]

---

① 《陕西宁夏总兵刘芳名揭帖》，顺治三年正月十九日，《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526页上。亦可参看秦晖：《关于贺珍与清初陕南抗清运动的若干问题——与童恩翼同志商榷》，秦晖：《鼎革之际：明清交替史论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10–329页。

② 孟乔芳：《题为汉兴要地宜设巡抚重兵以资弹压事》，《孟忠毅公奏议》，第56–57页。

③ 冯达道修，王浩远校注：《顺治汉中府志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4页。按，该书成书于顺治十三年至十七年之间，为反映当时汉中驻防规制的重要原始史料。

④ 《清世祖实录》卷38，顺治五年四月丙戌。

⑤ 自二十二日命调，闰四月二十一日离京开赴汉中。参见《清世祖实录》卷38，顺治五年四月丁亥、闰四月乙卯。

⑥ 陈跃：《清代陕甘地区八旗驻防研究》，第100–115页；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22页。

⑦ 冯达道修，王浩远校注：《顺治汉中府志校注》，第94页。

⑧ 滕绍箴：《三藩史略》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29页。

⑨ 冯达道修，王浩远校注：《顺治汉中府志校注》，第66–67页。

⑩ 《钦定八旗通志》卷22《旗分志二十二》，卷208《人物志八十八》，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5册，第388、3714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中华书局，1990年，第80页。

⑪ 《清世祖实录》卷38，顺治五年四月丙戌。

⑫ 仅举数例。如正黄旗汉军第四参领第二佐领代都“由工部侍郎外任汉中梅勒章京”；正红旗汉军佐领第四参领第一佐领王尚智“升任汉中府驻防甲喇章京”；镶红旗汉军第二参领第四佐领王秉政“升任汉中驻防参领”；镶蓝旗汉军第四参领第二佐领朱万化“驻防汉中”。参见《钦定八旗通志》卷23《旗分志二十三》、卷25《旗分志二十五》、卷27《旗分志二十七》、卷29《旗分志二十九》，第1册，第417、446、466、491页。

表 1　李国翰所属右翼汉军官兵人员表

旗分	职官						兵丁				总计	家口
	阿思尼哈方	阿达哈哈方	甲喇章京	牛录章京	分得拨什库	笔帖式哈方	甲兵	笔帖式	苏喇甲	弓铁匠		
厢蓝	1	2	1	2	5	2	208	-	151	11	383	3168
正黄	1	1	1	3	5	-	324	1	76	11	423	3504
正红	1	3	1	1	5	-	222	1	50	10	294	2427
厢红	-	1	1	3	5	-	238	1	14	11	274	2465
总计	3	7	4	9	20	2	992	3	291	43	1374	11564

资料来源：冯达道修，王浩远校注：《顺治汉中府志校注》，第 91–92 页。

固山额真，顺治十七年定汉称为都统。[①] 清代八旗驻防中以将军和都统驻防为最高层级的驻防，当时汉中政治地理区位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其驻防规制，从表 1 中可以看到，固山额真下设有阿思尼哈方 2 人，阿达哈哈方 7 人，甲喇章京 4 人，牛录章京 9 人，分得拨什库 20 人，笔帖式哈方 3 人。阿思尼哈方（ashan i hafan），又作阿思哈尼哈番，为清代世袭爵职之一，乾隆元年（1736）更定为男爵。阿达哈哈方（adaha hafan），又作阿达哈哈番，为清代世袭爵职之一，乾隆元年更定为轻车都尉。[②] 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分得拨什库，顺治十七年分别定汉称为参领、佐领、骁骑校，[③] 均为管理驻防八旗军政事务的中低层级官员。笔帖式哈方（bithei hafan），即专司书写文书工作，具有顶戴品级的文书官员。[④] 每旗又分设甲兵、笔帖式、苏喇甲、弓铁匠，人数各不等。甲兵，即八旗披甲旗兵。笔帖式，中低级文书。苏喇甲，苏喇满文作 sula，意为闲散，苏喇甲为闲散披甲。从表 1 来看，汉中驻防八旗官兵总共有 1374 人。除此之外，八旗兵丁外出驻防均携带家口，时汉中驻防八旗官兵家口总共 11 564 人，八旗人口总数将近 1.3 万人。

除李国翰所率八旗军之外，平西王吴三桂部众人数更多。其下辖二等京奇尼哈番（jingkini hafan）1 人，一等阿思哈哈番 1 人，三等阿思哈哈番 20 人，一等阿达哈哈番 1 人，二等阿达哈哈番 51 人，三等阿达哈哈番 46 人，白塔喇布勒哈番（baitalabure hafan）43 人，拖厦喇哈番（tuwašara hafan）67 人，法一丹你大（faidan i da）1 人，法一丹你哈番（faidan i hafan）5 人，一等虾（hiya）4 人，二等虾 5 人，三等虾 6 人，部札副将 1 人，参将游击 12 人，都司守备 119 人，官员总共 383 人。其兵丁有马战甲 3855 人，苏喇甲 608 人，步战兵 3000 人，共计 7463 人。此外，王府及官兵家口总计 60 423 人。平西王吴三桂所属官兵及其家口总计有 68 269 人。[⑤]

李国翰、吴三桂两军驻扎汉中，官兵及家口总人数达 8.1 万人之多，其粮饷马乾的支放成为重中之重。当时粮饷马乾支放，笔者简作表 2。从表中统计来看，汉中驻防两军总计岁支官兵俸饷银恩赏银 26.4972 万两，俸米 24.1023 万石，豆 27.68094 万石，草 1186.326 万束。陕督孟乔芳曾感叹，汉中“驻平西王、固山并镇守各兵，杂沓而居，幅员既狭，供应尤艰”。[⑥] 如此浩繁的军饷开支，已成陕省督抚燃眉之急，更成为后来裁撤驻防的关键因素。

①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 171《八旗都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5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428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 23，乾隆元年七月戊申。
③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 171《八旗都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5 册，第 428 页。
④ “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皆系六七品官”，其与一般从事文书工作的笔帖式的区别在于品级相对较高，拥有顶戴。顺治十五年废止。该年，顺治帝谕吏部各衙门：“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专司书写册籍，俱着裁去衔品，以后止设无官品笔帖式。”参见《清世祖实录》卷 87，顺治十一年十二月戊寅；卷 119，顺治十五年七月己未。
⑤ 冯达道修，王浩远校注：《顺治汉中府志校注》，第 89–90 页。
⑥ 孟乔芳：《题为省兵节饷以求实用谨陈一得之愚仰祈圣鉴事》，《孟忠毅公奏议》，第 87 页。

表 2　汉中驻防军开支表

单位：银：两；米、豆：石；草：束

分类	固山、王岁俸银	官员岁俸银	兵丁岁饷银	官兵家口岁俸米	马乾
李国翰军	固山：2 060 固山夫人：80	7 000	31 380	37 389	豆：57 418.2 草：2 460 780
吴三桂军	俸银：3 000 恩赏银：4 000	56 340	161 112	203 634	豆：219 391.2 草：9 402 480
总计	9 140	63 340	192 492	241 023	豆：276 809.4 草：11 863 260

资料来源：冯达道修，王浩远校注：《顺治汉中府志校注》，第 89–92 页。

汉中“兵火饥荒之后，未能尽复其初”，① 本地无法满足全部粮饷供应，为此清廷一则是裁减汉中八旗粮饷。② 二则于关中转输粮饷，称之为汉运。③ 汉运虽能解决部分粮饷问题，然而一方面陕省兵马云集，各路所需粮饷均繁，④ 尤其汉中“官兵需用本色尤多”，⑤ 陕省不得不频繁预征未来几年额赋，以致顺治朝秦省预征额赋之频繁为各省之最。⑥ 这无疑给陕省田赋征收、粮食派买带来很大压力，所谓“吴三桂驻汉中，招买繁重，民不堪命”，⑦ 甚至一度引起督臣金砺有吴三桂、李国翰两军米石草料“尽解折色”之议；⑧ 另一方面，汉运粮饷必经秦岭连云栈道，其间“缘山崖铲为路，行人蚁接以行。路阔者丈许，狭者数尺”。⑨ 险恶交通如此，只能“肩挑驴驮，老携幼戴，民力几费十万金”。⑩ 汉运艰苦，怨声载道。

更可说者，李国翰等军入驻汉中，又使该地兵民矛盾突出。顺治《汉中府志》有言：“或疑兵民杂居，主客不相能，乃今帖然按堵，刀剑牛犊，两无侵害，民乐以正赋代壶箪。即有召买之役，亦容当事者之委婉参亭，惟恐重烦民力也。则藩镇之节制严而轸恤挚也。”⑪ 此论言过其实，掩盖了当时的主客兵民矛盾。“吴三桂驻汉中，兵民错处，豪猾依倚为奸，百姓患之。”⑫ 无独有偶，清初八旗驻防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⑬ 这也是清初讨论是否驻防以及裁撤一大批八旗驻防的原因。⑭

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捉杀永历帝，清廷基本上统一全国。随着西南战局的结束，汉中在战事中的关键地位发生改变。顺治十六年三月，洪承畴奏请调整西南镇守布局，议政王大臣

① 冯达道修，王浩远校注：《顺治汉中府志校注》，第 30 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 64，顺治九年四月丁未。
③ 陈雪：《川运与汉运：顺治年间陕西的军粮筹措》，《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④ 征川之前，孟乔芳奏称“秦省七镇及督抚各标官兵计九万八千有奇，合满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额真兵，每岁共需饷银三百五十九万余两，而秦赋熟粮并钱息仅一百八十六万有奇，缺额者一百七十余万，年复一年，后将难继”。可知，当时粮饷之征收基本上是一半缺额，财政压力不可不谓之巨大。见王士祯：《孟公乔芳神道碑铭》，钱仪吉：《碑传集》卷 5《国初功臣上》，中华书局，1993 年，第 1 册，第 103 页。
⑤ 孟乔芳：《题为秦省召买必至累民兼误军需谨激切披陈仰祈圣鉴事》，《孟忠毅公奏议》，第 100 页。
⑥ 陈锋：《顺治朝的军费支出与田赋预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 第 1 期。
⑦ 雍正《陕西通志》卷 53《名宦四》，《中国地方志集成 · 省志辑》第 3 册，凤凰出版社，2011 年，第 67 页。
⑧ 督臣金砺以军粮每石一两派买，难以完项，奏请汉中驻防粮饷“尽解折色”。这项奏议激起吴三桂与李国翰联名反对，一则改发折色之数实少，汉中粮价昂贵，难敷军食；二则如此势必短价强买，激起民愤。因而必须转运粮石本色。《平西王吴三桂等题本》，顺治十二年三月初七日，《明清史料》丙编第 9 本，第 888 页。
⑨ 冯达道修，王浩远校注：《顺治汉中府志校注》，第 120 页。
⑩ 刘瀚芳、冯文可：顺治《扶风县志》卷 4《艺文志》，清顺治十八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 34 页下。
⑪ 冯达道修，王浩远校注：《顺治汉中府志校注》，第 94 页。
⑫ 雍正《陕西通志》卷 54《名宦五》，第 3 册，第 83 页。
⑬ 郑宁：《清初江南的八旗驻防与地方应对——以杭州满营建设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19 年第 3 期。
⑭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 26–29 页。

会议“汉中已属腹里，兼有四川阻隔”，不需再驻重兵，故“命平西王驻镇云南，平南王驻镇广东，靖南王驻镇四川”。[①] 至于李国翰所属四旗驻防官兵在西南平定后，回防汉中，[②] 时兵额在一千人左右。[③]

吴三桂移藩云南，汉中已成腹里，而不再是清廷之边地，战略地位自然下降。而主客兵民之矛盾，尤其是粮饷之繁重、转运之艰难，使得汉中驻防裁撤也在所必然。笔者暂未查得裁撤驻防的直接谕旨与时间，但大抵可从相关记载寻得汉中驻防裁撤之线索。

其一，清廷开始裁减全国兵额。顺治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户部奏称国赋不足“皆由兵马日增之故”，“腹里之保定、沧州、太原、西安、汉中皆有满兵驻防，除督抚镇标外，其余各营亦当酌减”。[④] 此处虽仅言及裁减各地绿营兵，但从整体部署上来看，裁撤兵马、节省国赋是当时清廷财政思想主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中八旗驻防的裁撤。其二，汉中军事布防的调整。自吴三桂移藩云南，汉中兵力骤降。顺治十六年九月十六日，陕西巡抚张自德奏请汉中或复置总兵，或另增八旗劲旅驻防。[⑤] 奏入，“下兵部议”。[⑥] 部议结果未知。然顺治十八年二月，兵部题：“将暂驻兴安之提督王一正率标兵三千移镇汉中……从之。”[⑦] 同年六月，吴三桂奏：“倘臣下官兵家口（即王一正——笔者）迁移之后，汉中照设一镇，以资弹压……从之。”[⑧] 从这两条记载来看，张自德奏设总兵的建议最终得到施行，清廷渐以绿营取代八旗驻防之意显矣。而后，在官书中也再未出现顺治朝汉中八旗驻防的情况。可以推测，在上述背景下，汉中驻防即予裁撤。

此外，乾隆《和顺县志》记载了和顺、乐平两县驿站协济问题，其中论及汉中驻防兵回京情况：

> 顺治十八年协□以前，原有凡遇车辆经过至百辆以上者，和邑暂协三分之一，所以十一月内汉中驻防回京家口，柏井、扳害协骡，昼夜驰行三百余里，人畜苦累不堪。[⑨]

该段史料中明确提及顺治十八年十一月汉中驻防官兵及家口回京路过和顺、乐平两县，似可作一佐证。综合前述各项背景因素，汉中八旗驻防于顺治十八年奉裁回京应无疑义。

概而论之，顺治年间汉中确有八旗驻防。主要是以李国翰所属四旗汉军官兵，吴三桂所属藩兵同驻汉中。这是有清历史上汉中第一次派驻经制八旗驻防，也是有清历史上八旗与异姓藩王同驻的特例。后因汉运转输艰难，驻防地兵民矛盾激化，西南战事休停，清廷开始缩减兵额等原因，汉中恢复设镇，以绿营驻防汉中。汉中驻防八旗，则于顺治十八年被撤回京。

二、平定三藩之乱与汉中八旗驻防

（一）汉中八旗驻防及其规制

康熙朝汉中驻防实因三藩之乱而起。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叛，一时南国风起云涌。整个南北双方的对峙局面分为东中西三线，东线以闽浙、两广（孙延龄、耿继茂、郑经）为主，中线以湖广与江西（吴三桂）为主，西线以陕甘川（王屏藩等）为主。吴三桂联盟东

---

① 《清世祖实录》卷124，顺治十六年三月甲寅。
② 《清世祖实录》卷136，顺治十七年六月乙未。
③ 凤翔知府项始震在顺治十六七年左右，奏请罢汉运时称汉中“满洲驻防不过千人。”参见刘瀚芳、冯文可：顺治《扶风县志》卷4《艺文志》，第34页下、35页上。
④ 《清世祖实录》卷136，顺治十七年六月乙未。
⑤ 《陕西巡抚张自德等揭帖》，顺治十六年九月十六日，《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第976页。
⑥ 《清世祖实录》卷128，顺治十六年九月甲戌。
⑦ 《清圣祖实录》卷1，顺治十八年二月丁未。
⑧ 《清圣祖实录》卷3，顺治十八年六月甲午。
⑨ 黄玉衡：乾隆《和顺县志》卷4《田赋志》，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46页上。

中西三线全面进攻，清军亦三线应对。双方交战过程中，东中线大致以长江天堑为准线，长期僵持。

西线则以汉中为界，进战退守。起兵不久，吴三桂即打算进四川，占汉中，北上陇西关中，再东北行径山西直捣北京。[①] 因此，汉中成为西线双方争夺、据守的关键。然而清廷在西南节节败退。至康熙十四年初，清军“撤回汉中”，[②] 王屏藩占领四川。清廷虽增兵汉中，然十四年七月，兴安游击王可成等复叛，总兵官党塞等奔至西安；[③] 驻守汉中之席卜臣兵粮匮竭亦撤回西安。[④] 至此，“兴安、汉中地方，已被贼据”，[⑤] 关中、陇西顿时成为两军对垒之前线阵地。同年十月，王屏藩率众自汉中北进关中，西犯秦州，[⑥] 清廷西线布防崩溃，关中、陇西岌岌可危。幸而清廷增兵西线，命大将军图海率军平定王辅臣叛乱，[⑦] 解西线后顾之忧才扭转战局，王屏藩等据守汉中而不再北上。

至十八年春，清廷收复湖南、广西，整个战局进入最后的反攻阶段后，西线反攻也被提上日程。清廷自然清楚，王屏藩“以川蜀为巢穴，以汉兴为藩篱，进战退守，全在于此”，“必破其藩篱，始能入其巢穴”，“欲为入川计，不得不亟取汉兴”。[⑧] 同年六月，图海受命速取汉中、兴安，[⑨] “大兵俱抵汉中”，[⑩] “粮饷运至汉中、略阳”，[⑪] 汉中为西线进军基地。十八年十二月，清廷命将军王进宝、提督赵良栋率兵征定四川，[⑫] 至十九年春四川平定。与此同时，清廷开始全力反攻，分中路湖广、西路四川、东路广西三路共进云贵。二十年十月，三藩之乱平定。[⑬]

战事结束，清廷开始总结教训。一则吴三桂主力能够迅速抵达荆湘地区，全在于清廷在华中地区的八旗驻防兵力不足，难以迅速应对；二则西线难以突破，皆因汉中失守。故华中与西南应增派八旗驻防，以备不虞。康熙二十年十二月，议政王大臣等议定荆州、汉中应设八旗驻防，其“汉中应设汉军将军一员，副都统二员，八旗每旗各设协领一员，参领一员，防御十员，骁骑校五员，拨出兵丁三千名发往。从之”。[⑭] 康熙朝汉中经制八旗驻防自此始，此即刘献廷《广阳杂记》所谓汉中驻防“复添设焉”。[⑮]

不过，八旗兵到防则在两年之后。一则是军事调动周期较长，二则城垣、衙署建造亦颇费时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兵部等衙门议覆称发往荆州、汉中等驻防兵，应“俟房屋盖造将完，具报到日，再将官兵发往”。[⑯] 从次年正月奏报来看，至迟在二十三年正月汉中驻防

---

①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 16 册，中信出版社，2013 年，第 21、648、650 页。

② 《兵部议四川总督周有德疏之题本》，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 1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年，第 345 页。

③ 《平定三逆方略》卷 17，康熙十四年七月己酉，《清代方略全书》第 2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第 563 页。

④ 《平定三逆方略》卷 18，康熙十四年九月丁亥，第 2 册，第 580–581 页。

⑤ 张勇：《张襄壮奏疏》卷 3《题为酌移粮饷募兵征剿以靖逆氛事》，康熙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30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372 页。

⑥ 《平定三逆方略》卷 19，康熙十四年十月庚申、癸亥，第 3 册，第 2、3 页。

⑦ 《平定三逆方略》卷 21，康熙十五年二月壬戌、戊寅，第 3 册，第 54–55、133 页。

⑧ 张勇：《张襄壮奏疏》卷 5《题为兵分五路进取汉兴以图大举入川事》，第 408 页。

⑨ 《平定三逆方略》卷 45，康熙十八年六月戊子，第 4 册，第 160 页。

⑩ 《平定三逆方略》卷 49，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己卯，第 4 册，第 275 页。

⑪ 《平定三逆方略》卷 49，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丙戌，第 4 册，第 288 页。

⑫ 《平定三逆方略》卷 49，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己卯，第 4 册，第 277 页。

⑬ 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 年，第 271–277 页。

⑭ 《清圣祖实录》卷 99，康熙二十年十二月戊子。

⑮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 3，中华书局，1957 年，第 160 页。

⑯ 《清圣祖实录》卷 110，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庚辰。

八旗官兵已经到防。[①] 而在半年之内即到防，也说明此次驻防并未建造满城，仅限于衙署之建造。

汉中驻防规制，拟定最高长官为将军，下设副都统两员，驻防额兵三千人，为高层级驻防点。可以看出，清廷在经历清初两次大战乱之后对于汉中政治地理区位的重视。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西安将军希佛陛辞时，康熙帝强调“汉中必选精兵戍守，不得以疲弱者发往”。[②]

但在上述注重汉中驻防兵丁军事素质的同时，汉中八旗驻防规制发生变化。康熙二十二年，议政王贝勒大臣会推汉中将军，“正拟副都统孙承祖，陪拟李鳞龙”。对于如此人选，康熙帝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所推正、陪之人俱寻常，总非将军之才”。其解决之道，满汉公议认为，“现今西安府驻防右翼四旗兵丁，既有将军管摄，汉中亦应照八旗数目，派满洲、汉军兵丁各一半，各设副都统一员，仍令西安将军总管……将军责任不分，似可得驻防实济”。[③] 最后，兵部奏准，“于西安驻防兵内，拨出满洲兵丁一千名、汉军兵丁一千名，在汉中驻防。其副都统等官，量其兵丁派出驻防，仍令西安将军统辖”。[④]

经过两年筹划，由两位副都统统领八旗满汉两千人马驻扎汉中的规制最终形成。汉中由最初单独的将军驻防改为由西安将军统辖的副都统驻防，成为西安驻防之分支，实际上表明了汉中驻防地位在八旗兵实际到防之前已经悄然更变，以此变更又导引出三年后汉中驻防之裁撤。其间缘故，实有必要深究。

（二）汉中驻防之撤及其缘由

派驻八旗兵驻防汉中实乃清廷对于西南反叛的心有余悸之举措。但是，此次驻防无论是中央抑或地方官员均不无非议。正如顺治年间设置的汉中八旗驻防一样，在此次驻防实践过程中，八旗兵粮饷补给等现实问题接踵而至，催生地方官员提出调整，甚而裁撤驻防的意见。

驻防规制调整一开始有两种论调：一是康熙二十三年陕甘总督希福的轮防建议，他认为汉中驻有八旗、本地绿营以及新驻督标七千人，粮饷实在难支，若以关中馈饷，则转运维艰，因此奏请撤经制驻防改为督标兵丁“同满洲兵轮班前往驻防”。[⑤] 二是，康熙二十五年礼科给事中达奇纳的撤防主张，他认为汉中已属腹里，不必再设驻防，即“云南、四川既皆平定，似宜停其往戍”。[⑥] 鉴于地方粮饷供支的困境，康熙帝最终赞成了轮防建议。[⑦] 而达奇纳的撤防建议虽然并未得到康熙帝的立即认可，但也逐渐改变了康熙帝对汉中驻防的重新认知。康熙帝当即谕令地方督抚将军详加商议。二十五年六月，地方官员意见返至中央，引起了中央各官员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过程中康熙帝裁撤汉中驻防之意更加明确，他也通过一定手段影响决策过程，从而达到了裁撤汉中驻防的意图。

康熙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乾清门御门听政，各部院衙门及九卿、詹事、科道会议汉中驻防事。兵部尚书伊桑阿转奏陕西督抚意见，引起议论。现移录各方观点如下：

> 总督希福、巡抚图尔宸议：汉中寂为要地，应驻汉军兵一千名，副都统一员管辖。
>
> 西安将军希福（希佛）暨副都统等议：汉中距西安千里，道路不甚远，纵有不虞，自西安

---

① 《清圣祖实录》卷 114，康熙二十三年二月丁未。

② 《钦定八旗通志》卷 165《人物志四十五》，第 4 册，第 2862 页。

③ 《康熙朝起居注》卷 14，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④ 《清圣祖实录》卷 108，康熙二十二年三月辛未。

⑤ 《清圣祖实录》卷 114，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丁未。按，此条实录原文为“四川陕西总督禧佛”，禧佛又称希佛。据《钦定八旗通志》载，希福，满洲镶白旗人，纳喇氏，二十二年八月授川陕总督。同书又载希佛，满洲正红旗人，他塔喇氏，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授西安将军。此处从《钦定八旗通志》，参见《钦定八旗通志》卷 165《人物志四十五》，卷 169《人物志四十九》，第 4、5 册，第 2862、2944 页。后所引文，如有错置，径直修改，不再注明。

⑥ 《康熙朝起居注》卷 20，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二十六日。

⑦ 《清圣祖实录》卷 114，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丁未。

驰往未为不可，驻防无益。

九卿议：汉中原属岩疆，应设兵驻防，将西安之汉军一千名调往其地，分副都统一员管辖。

上曰：汉中用汉军千人驻防无益，若兵止一千，则兵力单弱，而军民杂处，百姓亦受其累。

佛伦奏曰：汉中甚为紧要，臣等以为非设兵驻防不可。令西安汉军分彼驻防，似属有益。①

讨论中，两派观点针锋相对。西安将军希佛等以为汉中距西安不远，即便有事可立即派兵前往，并不需派驻八旗。康熙帝也以驻防人少，军民杂处为由反对驻防。而陕西督抚以及工部尚书佛伦、九卿认为汉中战略位置关键，仍有设置八旗驻防的必要。第一轮的讨论，对于保留汉中驻防的意见明显占据优势。

从康熙帝同意轮防之日起，便可查知他对汉中驻防的作用与地位应有一番重新认识。三藩之乱仅仅结束五年，汉中八旗到防亦仅两年余，康熙帝态度转变何以如此迅速？值得细究。

在第一轮中央官员集议中，撤防主张处于劣势，康熙帝并未做出决议。待九卿等官退，康熙帝留各部院尚书、侍郎单独讨论此问题：

上复召尚书、侍郎谕曰：汉中用汉军千人驻防无益，纵有仓卒之事，此兵岂能独拒乎？若设兵驻防，民反受其累。且渐至年久，则此兵丁之子若孙皆成汉中人矣，能复习骑射耶？各处驻防多设旗兵，庶几犹习骑射，武备不致废弛。即如京师，满洲子弟尚有习汉语，耽于逸乐不以骑射为事者，况令旗人分居民地，与之杂处，其不学骑射又何待言？在京官兵每年二三次更番行围，盖专欲俾其练习武事。虽或有不愿者，停止可乎？且仍令旗兵驻防发祥之处，则围猎于荒山广野，日事骑射，断不至遗忘武备矣。若今将旗兵多驻外省，则兵力分而少，又无益于事。尔等会议此等事务，详加商酌，计及久远。虽国家兴衰皆由天命，而永承天命常保治安，可谓不在人事耶。谚云：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尔等常念及此，于大小事务当详加商酌，以图永久。诸臣奏曰：圣谕诚然。②

此时，康熙帝才和盘托出自己执意裁撤汉中驻防的理由，他最担心的是当时驻防八旗所面临的新问题：八旗久驻地方，渐习汉俗，不习骑射，其子孙后代渐成本地人，亦即后世学者所称的驻防八旗“土著化”③，这样势必导致八旗武力下降。康熙帝这一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一方面，自入关以来，“八旗人民崇尚文学，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遂至军旅较前迥别”，④ 武事堕怠愈演愈烈。如杭州驻防，康熙帝曾斥责“驻防满兵，渐染陋俗，多不束带，靸履而行。既为满洲，则当遵满洲职业，勤于骑射”。⑤ 即便是注重武备的京旗亦复如是，“八旗骁骑校，五旗护军校，尽属庸劣”。⑥ 因此在派驻荆州八旗时，康熙帝就谕令新任荆州将军以杭州驻防为戒，“杭州驻防满兵渐习汉俗，此等情事皆责在尔等”，定要“亲率兵丁，不时操练，务期队伍整肃，纪律严明”。⑦

另一方面，这与康熙帝对平定三藩过程中八旗兵战斗力下降的心有余悸关系甚巨。若对康熙朝八旗武力概论为衰弱，有失偏颇。但难以否认的是，相对于入关前后，八旗军队的军事素质与尚武精神确实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平定三藩战事中，八旗官兵的怯懦逡巡，显露无疑。康熙帝曾痛斥，八旗官兵“观望逗遛，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⑧ 江西战场，简亲王等“惟坐守省会，日

---

① 《康熙朝起居注》卷 20，康熙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② 《康熙朝起居注》卷 20，康熙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③ 潘洪钢：《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第 64 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 106，顺治十四年正月甲子。
⑤ 《清圣祖实录》卷 112，康熙二十二年九月戊寅。
⑥ 《清圣祖实录》卷 114，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壬辰。
⑦ 《清圣祖实录》卷 111，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戊午。
⑧ 《清圣祖实录》卷 71，康熙十七年正月戊戌。

事骑射，以图安逸……副将军希尔根不思报国，日驻省城，安逸自便”。[①] 将官兵丁，逗留观望，贪图安逸，坐失时机，八旗尚武之风，军事素质远不如前。[②] 三藩之乱对于康熙帝的影响可谓至深且远，平乱结束不久，康熙帝就有“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倘逆贼未能殄灭，其咎岂不尽归朕身”的感慨[③]，说明了他对此次战争的胜利并不报以信心，以及战争胜利之后的心有余悸。这种侥幸获胜的背后竟是如此不堪的八旗武力，不得不引起这位“满洲主子”[④]的警惕。

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八旗武力不再，而京旗、驻防旗人又疏于训练。如此不难理解，康熙帝对当时八旗军事素质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这也是为什么在三藩之乱后不久，康熙帝就陆续广设八旗官学与义学教以八旗人员国语骑射，开创木兰秋狝，[⑤] 八旗科考需试骑射[⑥] 等一系列维持旗人武力的改革。

而对于驻防八旗的更革，一方面是加强驻防与京旗的联系，确立八旗归旗制度；[⑦] 另一方面就在于谨慎增添驻防。其原因就在于前述“旗人分居民地，与之杂处，其不学骑射”，且驻防效果也是“兵力分而少，又无益于事”，这不仅分散了八旗兵力，亦加剧了八旗渐习汉俗的可能性。这种潜在危险与现实担忧促使康熙帝改变了对全国增派驻防的看法，开始调整八旗驻防，缩减驻防点。汉中驻防的裁撤即根本导源于此。

言及于此，康熙帝的心声表露无疑。康熙帝再次嘱咐各部院官，妥善再议，且强调八旗武备与天命国运息息相关，不可玩忽，应当计之久远。康熙帝如此垂训，显然给各部院大臣施加了压力，众大臣才回应“圣谕诚然”。这次单独“讨论”，完全影响了后面的决策结果。七月初一日（即两日后）：

> （上）御乾清门听政，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毕。大学士觉罗勒德洪……以折本请旨。九卿等会议汉中府驻防汉军官兵一千名，应派副都统一员管理。上曰：汉中驻防官兵，原属无益，且兵民交困，着停止。[⑧]

上月之议，康熙帝对部院大臣的“嘱托”显然起到效果，因此并无部院大臣反对。而九卿等官，因未受当面垂训，仍然反对裁撤驻防。不过，局势已然扭转，裁撤汉中驻防已成定论。至此，汉中的八旗驻防历史彻底告终。

三、雍乾时期汉中八旗驻防再议

如果说，顺康两朝汉中八旗驻防两驻两撤的历史经验表明该地并不适合长期驻防八旗的话，那么雍乾两朝又两度再议汉中驻防之举显然既忽视了历史经验，又背离了旧制。其因何而起，又因何而罢议，从未引起史家注意。值得进一步讨论。

众所共知，入关后八旗人口迅速增长。然则，“护军、马甲皆有定额，其不得披甲之闲散满洲，以无钱粮，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⑨] 清廷通过增设养育兵、旗民回屯、生息银两、清

---

① 《清圣祖实录》卷 62，康熙十五年七月辛巳。

② 姚念慈总结当时八旗武力状况与康熙帝心境时称之为“八旗梦幻的破灭与玄烨的心影”，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第 51–58 页。

③ 《康熙朝起居注》卷 11，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④ 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第 46 页。

⑤ 刘彦臣：《清代“国语骑射”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⑥ 《清圣祖实录》卷 140，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丁亥。

⑦ 吴华军：《清代驻防八旗归旗制度考论》，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年。

⑧ 《康熙朝起居注》卷 20，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⑨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 26《兵制一》，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494 页。

查旗籍、出旗等措施解决大量余丁旗人生计。[①] 而增设八旗驻防也是此中重要措施之一，如直隶热河、山东青州驻防的增设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京师旗人生计。[②] 即如西安驻防来说，其额设兵丁八千名，至雍正朝“户口繁滋，将及四万”，[③] 已然亦存在大量余丁。雍正七年（1729），陕西总督岳钟琪密奏于西安驻防内拣选兵丁派驻汉中，就在于解决西安八旗生计问题，因其所遣均为“八旗满洲、蒙古、汉军苏喇及开档闲散”。[④]

实际上，在雍正三年岳钟琪进京陛见之时，雍正帝即谕岳钟琪在“陕西之潼关、汉中二处设立驻防”。[⑤] 岳钟琪回任后即着手此事，次年三月，正式设立潼关城守尉驻防。[⑥]“至于汉中设兵镇守之处，原议潼关事竣再为次第料理”，但几经耽搁未果。至雍正七年三月初九日，岳钟琪方才密奏，从西安驻防苏喇及开档闲散三千二百三十六名中，抽调六百名马兵，九百名步兵，共一千五百名，派拨前往汉中驻防。并在汉中府城西门内空旷无人居住地方筑墙间隔，“分别居民界限，为官兵居住之所”，一切规格按照潼关案例建设。驻防八旗以副都统一员统管，其下设“协领四员，佐领八员，防御八员，骁骑校八员，笔帖式二员”。[⑦] 此次汉中拟设驻防属于中层级的副都统驻防，实际上也是西安驻防之分支。其有较之顺康年间驻防规模更甚者，则在于拟造满城作为官兵居留之所。

然则雍正七年西北出师在即，雍正帝接到密折后随即作出批示，“将彼处民情或系惮于驻兵，抑系情愿光景，尔等密加访查议奏，大兵凯旋之时方令屯驻”。[⑧]

在西师回撤之际，总理陕西巡抚事务史贻直却对即将实施的汉中驻防计划明确提出反对。其原因有两点。一则在于西部局势之转变。当时清廷基本上稳定了青藏局势，西南、青藏已无后顾之忧，西北准噶尔蒙古问题则急待解决。无论是出师西征前的宁夏经制驻防增设[⑨]，抑或是西师挺进过程中，清廷不断加强对西北的防控，陕甘地区的驻防重点转移至甘肃西北。早在议设汉中驻防时，雍正帝就有另建甘州、凉州驻防之意，岳钟琪甚至为此主张暂缓汉中驻防。[⑩]

二则，与此前汉中撤防的原因如出一辙，汉中实际上并不适合，且不必要派驻八旗。史贻直认为（1）该地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加之风土湿热，不易养马，旗兵难以驻此训练；（2）汉中本地已有汉兴镇总兵、汉凤营副将驻扎，兵力已足资防范；（3）汉中地位虽关键，但却已成腹里之地，远非西北边塞严疆可比。出于上述考虑，史贻直主张此时调整布防莫过于增强西北兵力，汉中“形势并非要害，无益边防”，“与其将八旗劲旅置汉中腹里之区，不若简精锐满兵

---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安双成：《清代养育兵的初建》，《历史档案》1991 年第 4 期；韦庆远：《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魏影：《清代京旗回屯问题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屈成：《清雍乾时期的“另记档案”清查》，《清史研究》2018 年第 3 期；郑小悠：《核心—边缘：乾隆朝“出旗为民”研究》，《文史》2016 年第 4 期；王志强：《清前期八旗生计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

② 参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 55–58 页；刘小萌：《清朝遗迹的调查》，第 7–10 页。

③《清世宗实录》卷 108，雍正九年七月癸亥。

④《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覆筹画汉中设立驻防八旗官兵情形请旨遵行折》，雍正七年三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4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806 页。

⑤《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覆筹画汉中设立驻防八旗官兵情形请旨遵行折》，雍正七年三月初九日，第 806 页。

⑥《清世宗实录》卷 42，雍正四年三月己亥。

⑦《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覆筹画汉中设立驻防八旗官兵情形请旨遵行折》，雍正七年三月初九日，第 806 页。

⑧《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等奏复屯驻西安等处兵丁情形折》，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5 册，第 429–430 页。

⑨ 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后，年羹尧为加强西部边防，奏设宁夏将军一员，“派驻防兵二千二百名”。《清世宗实录》卷 17，雍正二年三月丙申；卷 25，雍正二年十月乙未。

⑩《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覆遵议派兵驻防甘凉事宜并请暂缓选派汉中驻防兵丁折》，雍正七年三月十七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4 册，第 845–846 页。

为凉州控压之用”。[①] 此议不仅仅是地方官员实践所得之见，也得到军机大臣鄂尔泰等人的首肯：

> 西边甘、凉、肃等地，与番子等接壤，实为沿边要道，俟大军返回后，理应驻兵防守。……汉中乃腹中之地，无需派驻满洲兵丁；凉州乃甘肃之咽喉，全省汇总之地，倘派八旗兵丁驻守，若遇有调遣之处，较之宁夏、西安，出塞不仅近便……西宁地方孤悬边陲，相距青海甚近，与番子等比邻相居，亦应严加防守。……将凉州派驻满洲兵丁二千名，西宁派驻一千名，于边疆安稳似有裨益。……凉州补放将军一名，副都统一名，西宁补放副都统一名。将驻守西宁之官兵，由凉州将军兼管。……俟大军返回时，再将官兵派驻凉州、西宁。[②]

可见，自西南反清势力解决，汉中已为“腹中之地”，相比西北凉州、西宁，难称战略关隘。时移势易，随着西北新疆、蒙古问题的凸显，河西之地驻扎重兵才是首选。乾隆二年（1737），西安满洲大兵正式驻防凉州、庄浪。[③] 诚如史贻直所论，“分驻满兵，原为弹压地方，控制要害”，[④] 即便是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汉中也并非再是适宜驻防点。汉中驻防，终作罢论。这也是六年以后，解决凉州、庄浪八旗生计问题时再度主张汉中驻防，同样立遭反对的原因。

乾隆六年三月初四日，兵部侍郎鄂弥达奏陈甘肃省仓储事宜事时，指出甘省丰备仓储之举措，大致有两途。[⑤] 一是开源，主要是捐监仓谷和开垦荒地。二是节流，鄂弥达认为甘省仓储“大概困于满兵之驻扎，而满兵之累尤于凉地米粮之艰难与气候之严寒为最甚也”。乾隆元年，虽凉州、庄浪二处添驻满兵甲步四千名，但是合之家口、跟役不下三万余人，“每年应需半本粮料一十一万四千七百有余，半本草二百九十二万八千四百余束”，但“本地出产无几，虽在丰年价已数倍，偶遇歉薄又必远处协办，则采买挽运，种种贻累百姓，实有万不能支之状，而满兵亦有断难久驻之势”。[⑥] 在鄂弥达看来，两处驻防八旗人口、马匹众多，粮饷、草料支绌，对于当地财政开支造成巨大压力。道光朝以前，甘省兵马云集，兵马总数位居全国前列。[⑦] 鄂弥达认为如此兵马已足够防范西北边情，可以将凉州驻防八旗兵分遣至他处。至于选址，他认为成都、汉中当为首选，一则成都所驻满兵“止一千三百余名，营制殊属单弱”；二则“汉中一府乃秦蜀咽喉险峻要区，康熙年间曾驻满兵二千名，因四川平定撤回。且汉中与四川悉系水地，粮草丰饶，气候和暖，物价平贱，若添兵驻防，地方有益无害”。故可将凉州所驻满兵，挑选甲兵各一千名，步兵各三百名分别添驻成都、汉中。如此既增加了成都、汉中等西南地区的兵力防务，又缓解了甘省自身的粮食储备压力。[⑧]

鄂弥达此奏经军机大臣转咨陕甘总督尹继善会同陕甘川巡抚查勘议奏。尹继善等会议认为，凉州满兵转移地方，成都诚可，但汉中“崇山深谷，形势不称，风土湿热，马性不宜，而出产粮草亦只敷现在兵民之需。四面险阻，贩运不通，一添满兵，断难供应”。因此，汉中并非是

---

① 《川陕总督尹继善奏为遵议鄂弥达请移凉州庄浪二处满兵及河州捏贡川开垦事》，《宫中档朱批奏折》，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所引档案如无特殊说明，均藏该馆），档案号：04-01-03-0114-005。

② 《大学士鄂尔泰等议奏将西安满洲蒙古兵丁派驻凉州西宁等地折》，《军机处满文议覆档》，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档案号：789-0001。

③ 《川陕总督尹继善奏为遵议鄂弥达请移凉州庄浪二处满兵及河州捏贡川开垦事》，《宫中档朱批奏折》，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档案号：04-01-03-0114-005。按，本欲驻扎西宁之兵后改驻庄浪。

④ 《川陕总督尹继善奏为遵议鄂弥达请移凉州庄浪二处满兵及河州捏贡川开垦事》，《宫中档朱批奏折》，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档案号：04-01-03-0114-005。

⑤ 甘省仓储事涉赈济，兼顾军糈，为清廷所重。乾隆初年清廷不断丰备该省仓储储量，此次鄂弥达所奏亦其中措施之一。相关研究参看屈成：《清代甘肃备荒仓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

⑥ 《兵部侍郎鄂弥达奏陈甘肃捐谷备荒及甘凉应移满兵各情形事》，《宫中档朱批奏折》，乾隆六年三月初四日，档案号：04-01-35-1115-026。

⑦ 翁同爵：《皇朝兵制考略》卷 1《直省兵额表》，《续修四库全书》第 85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649-650 页。

⑧ 《兵部侍郎鄂弥达奏陈甘肃捐谷备荒及甘凉应移满兵各情形事》，《宫中档朱批奏折》，乾隆六年三月初四日，档案号：04-01-35-1115-026。

合适的驻防地点。他进一步认为，潼关地方“锁钥全秦，毗连晋豫，依山带河，夙称天险。而附近额征又足供支兵米”，应当移驻一千名八旗兵驻防，成都驻防为数亦少，应移驻一千名八旗兵。① 在尹继善看来，无论是地理气候环境、道路交通状况，还是地方产粮能力，汉中都不适宜驻防旗兵。至此，汉中难再称合适驻防地点，驻防计划终究再次作罢。

四、汉中八旗之驻撤与清初驻防格局之更移

自平定三藩之乱后，直到 18 世纪中叶，“八旗驻防的营区才系统地、永久性地布署在了整个中国的军事要地”。② 其最终定型完备的标志，是密云副都统与成都将军的设置。③ 而在此之前，八旗驻防格局根据全国形势需要，不断调整，变动不居。其间调整变更的原因，不一而足；变革的整体趋势则是完善直省驻防体系，加强边疆驻防实力。汉中八旗驻防历经顺康雍乾四朝的驻撤议设，其派驻八旗既考虑到汉中战略地位之关键，也牵涉清代八旗生计这一现实问题；其撤防与罢议驻防，既有汉中难以支撑驻军粮饷等具体原因，也有防止八旗驻防渐习汉俗的特殊考虑。因防止汉化而最终收缩直省驻防政策，虽出于康熙帝的特殊考量，但其背后也实为驻防格局大势转变所左右。应该说，驻防的演变过程，固然是汉中一地八旗驻防历史脉络的呈现，但更重要的是其折射出清朝政治地理空间扩展和八旗驻防格局演变。

有学者将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地理大势描述为棋盘格局，河北、关中、四川、东南为之四角，山西、汉中、湖北、山东为之四边，中原为之天元。天下大势由分趋合，得四角之势必争四边之利才可统一天下；天下大势由合趋分，亦必争四边之利方可保固统一之势；中原为四通八达之地，无论分合均须据守。④ 棋盘格局论对于诠解中国政治地理空间架构具有很强解释力。然此说明显是局限于内地十八行省这一政治地理空间，当王朝国家疆域扩大，棋盘格局中四角四边的重要性也并非全然不变。其中以作为四边之一的汉中，变化最为明显。

汉中八旗驻防受清朝的政治地理格局与战事部署所左右，其与清初征定西南和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事关系密切。汉中为西南势力与清廷双方必争之地，即《孙子兵法》所谓“我得则利，彼得亦利”之“争地”。⑤ 在清初平定西南过程中，汉中成为清廷进军西南的屯兵、储粮基地；平定三藩期间，汉中成为清廷与吴三桂双方在西线拉锯的核心地带，吴三桂势力得进关中、陇西，全在据守汉中一地。清廷得进巴蜀以至云贵，也皆因收复汉中，汉中战略军事地位藉以凸显。除了“争地”这一属性外，汉中实际上也是清廷收复西南过程中的前沿“边地”，双方势均力敌之时皆以汉中为边界。然而，一旦西南局势稳定，则汉中战略地位则不复如初，“争地”“边地”转而为“腹里”。大致与此同时，西北准噶尔部逐渐统一漠西蒙古，并极力扩展版图，为西北雄长。⑥ 顺康时期，在解决南方反清割据势力之后，无论是借平定三藩以赏赉名义遣使奇塔特深入西北厄鲁特、喀尔喀蒙古境刺探虚实，抑或是于宁夏增设八旗屯守，一改此前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谨慎的以羁縻、笼络为主的策略，⑦ 均表明清廷战略部署重点逐渐由直省转移至西北边塞。由于俄国势力的东进，准噶尔蒙古失去西亚、北亚等大片区域作为回旋余地，只

---

① 《川陕总督尹继善奏为遵议鄂弥达请移凉州庄浪二处满兵及河州捏贡川开垦事》,《宫中档朱批奏折》，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档案号：04-01-03-0114-005。

② 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第 9 页。

③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 101-104 页。

④ 饶胜文:《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6 年。

⑤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4 页。

⑥ 黑龙:《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 1672-169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40-62 页。

⑦ 黑龙:《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 1672-1697》，第 63、73-80 页；滕绍箴:《论清代宁夏八旗驻防及其历史贡献》,《北方文物》1997 年第 4 期。

能在与清廷的冲突中全力搏斗，由此造成17至18世纪清廷不得不“以西北为战略重点”①。正因战略重点转移，清廷的八旗驻防重点也随之变更。康熙中期以后，清廷驻防体系的布防转移至对东三省将军驻防体系、西北长城沿线、控扼蒙古地区的东南北三线以及新疆以伊犁为核心的驻防体系的完善。② 如此，成为“腹里”的汉中，不再是清廷布防的重点，汉中派驻八旗驻防实则并无战略意义。清廷总以汉中转为“腹里”“腹中”为由裁撤汉中驻防，这也为雍乾时期罢议汉中驻防的关键所在。随着国家统一局面的不断形成，政治地理格局也随之变动，清廷战略部署重点也为之一变，作为棋盘格局中四边之一的汉中，其战略地位也不得不为之变更。

政治地理空间变化导致的驻防格局更移，为具体的驻防点更置所验证，亦可进一步发现汉中驻防的裁撤实际上正是这一渐变的关键转折点。平定三藩后，清廷在三藩旧地、荆州、汉中广设驻防，这确实表明清廷“开始在南部中国重新布署驻防，并进一步加强了满族对中原地方的统治”。③ 不过，这也是清廷驻防重点转移至边疆前，最后一次在战略要点大规模新增直省驻防。这一方面可以从前引康熙帝自己所述“若今将旗兵多驻外省，则兵力分而少，又无益于事”④ 的谨慎增设驻防论调可以看出，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汉中驻防裁撤前后全国驻防点增设及其分布格局的变化证得。

表 3　清代直省八旗驻防表

省份	顺治朝		康熙朝		雍正朝		省份	顺治朝		康熙朝		雍正朝		乾隆朝	
	驻防	时间	驻防	时间	驻防	时间		驻防	时间	驻防	时间	驻防	时间	驻防	时间
直隶	山海关	元	冷口	九	热河	元	山西	太原	六	右玉	三十二			绥远	二
	密云	元	罗文峪	九	郑家庄[1]	元				归化	三十二				
	采育里	二	宝坻	十二	天津水师[1]	四	山东	德州[2]	十			青州	七		
	昌平州	二	玉田	十二			河南			开封	五十七				
	张家口	二	霸州	十二			江南	江宁	二			江宁水师	五		
	喜峰口	二	滦州	十二				京口	十六			京口水师	五		
	古北口	二	雄县	十二				苏州[3]	十八						
	独石口	四	永平	三十四[4]			浙江	杭州	五			乍浦水师	六		
	顺义	五	千家店	五十			福建			福州	十九	福州水师	六		
	沧州	五					广东			广州	二十	广州水师	七		
	保定	六[2]					湖北			荆州	二十二				
	三河	六					陕西	西安	二			潼关	四		
	东安	六						汉中	五	汉中	二十二				
	固安	七					甘肃					宁夏	二	凉州	二
	良乡	八												庄浪	二
							四川			成都	五十七[5]				

资料来源：康熙《畿辅通志》卷7《驻防》；康熙《永平府志》卷14《官师》；乾隆《太原府志》卷20《兵制》；光绪《昌平州志》卷13《营卫志》；咸丰《固安县志》卷5《驻防官》；《八旗通志初集》卷24《营建志二》，卷35《职官志二》，第443-450，629-634页；《钦定八旗通志》卷117《营建志六》，卷118《营建志七》，第3册，第1992-2020页；《顺治汉中府志校注》卷2《建置志・藩镇》；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17-18页；王刚：《清初苏州八旗驻防探析》，《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潘洪钢：《清代八旗水师与海防体系》《福建论坛》2020年第3期。

说明：1. 郑家庄驻防、天津水师驻防，乾隆三十二年俱裁。参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107页。2. 顺治五年设驻防于大名府，次年移驻防至保定府。德州驻防于顺治十年于河间府移驻。参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17-18页。3. 苏州驻防，康熙三年裁撤。参见王刚：《清初苏州八旗驻防探析》，《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4. 永平府驻防，康熙三十四年自滦州移驻，并非新设。康熙《永平府志》卷14《官师》。5. 乾隆四十一年改设成都将军驻防。参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102-103页。

① 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构建：1644-1945年的中国》第3卷《军事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65页。
②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31、36-44、59-102页。
③ 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第1页。
④ 《康熙朝起居注》卷20，康熙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顺治年间，清廷征战全国，其驻防之地多是随着疆域拓展而设定。从表 3 中可以看到，顺治朝驻防重点是以畿辅直隶为重点，次之以进军征战后的战略要地如太原、德州、江宁、京口、杭州、苏州、西安、汉中等地，目的在于巩固畿辅，弹压地方。康熙朝前朝八旗驻防重点是继续完善畿辅驻防体系，大多数驻防是在平定三藩后于广州、荆州、福州、汉中设立的针对性极强的驻防。在汉中驻防裁撤后，除了右玉、归化、千家店、成都、开封五处新设、移驻驻防外，康熙中后期未再新设直省驻防。相比于顺治朝直省增设驻防数量来说，这显然无法相提并论。而且康熙中后期增设驻防，其山西北部之归化、右玉，京师西北长城以外之千家店均为临近蒙古之地，成都为控扼西藏之关键，所设驻防均界蒙古、西藏。八旗驻防的重心已非直省，开始向边疆转移。

雍正朝直省驻防重点，一是对直省关隘之地查漏补缺，如潼关、青州；二是增加八旗兵种，如天津、江宁、乍浦等水师营；三是备边，如宁夏、凉州、庄浪、热河。[①] 除天津外，水师营的设立是以原有驻防为依托，是原有驻防体系的扩展而非新设。因之，实际上雍正朝的直省驻防设置也是以备边为主。乾隆朝，除了移设绥远城驻防将军外，并无新设直省驻防。在平定新疆之后，其驻防重点已经转移至西北边塞，构建新疆驻防体制。[②]

总体来看，裁撤汉中驻防以前的四十余年，清廷在直省设置八旗驻防 33 处，此后至乾隆朝的百年内新增设仅 19 处。以汉中驻防的裁撤为界，前此驻防重点在内地，而后此则转向沿边及边疆。汉中驻防之撤实则是驻防重点由内地向沿边、边疆转移的标志，是康熙中后期至乾隆朝构建新疆驻防体系这一不断向边疆派驻八旗驻防的演化脉络的先导。

汉中驻防，驻而复撤，撤而复驻，旋即又撤，再度议设，这种前后反复的驻防政策的出现，既由汉中本身战略地位关键、清廷军事行动与解决八旗生计所决定，也为粮饷供应、地理气候环境、兵民矛盾、防止旗民汉化等原因所影响。汉中驻防政策的摇摆，表明乾隆朝以前清朝八旗驻防制度仍处于调适阶段，也说明自汉中驻防裁撤之后清廷的八旗驻防政策开始由内地转移至沿边、边疆。汉中驻防的驻撤过程，反映了清廷统一全国过程中政治地理空间的扩展。汉中八旗驻防在清初全国统一格局的演变中，完成了其历史任务，退出历史舞台。

Reference:

Chen Yue. “Qingdai shan’gan diqu baqizhufang yanjiu” (A study on the Eight Banners’ garrison in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in Qing Dynasty). In Bai Wenyu ed. *Minzu ronghe yu fazhan: jinian baqizhidu chuangjian 400 zhounian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symposium on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Shenyang: Niaoning minzu chubanshe, 2016.

Din Yizhuang. *Qingdai baqizhufang yanjiu* (Research on the Eight Banners’ Garrison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Shenyang: Niaoning minzu chubanshe, 2003.

Liu Fengyun. *Qingdai sanfan yanjiu* (Research on the Three Feudatories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Gugong chubanshe, 2012.

Liu Xiaomeng. *Qingchao yiji de diaocha* (Investigation of Qing Dynasty relics).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20.

Pan Honggang. *Qingdai baqizhufang zuqun de shehui bianqian* (Social Changes of Eight Banners’ garrison ethnic groups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2019.

Rao Shengwen. *Buju tianxia: zhongguo gudai junshi dili dashi* (Layout the world: the general trend of military geography in ancient china).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jiefangjun chubanshe, 2006.

Ren Guichun. *Qingchao baqizhufang xingshuai shi*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ight Banners’ garrison in

---

① 如前文所述，凉州、庄浪其动议与决定驻防在雍正时期。另郑家庄实则是为监控废太子胤礽而设，并无军事意图，且于乾隆三十二年裁。参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 107 页。

② 锋晖：《乾隆朝新疆八旗驻防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1993.

Teng Shaozhen. *Sanfan shilue*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8.

Wang Gang. "Qingchu Suzhou baqi zhufang tanxi" (A Study on the Banner garrison in Suzhou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2) 2013.

Yao Nianci. *Kangqian shegnshi yu diwang xinshu: ping "zigu de tianxia zhi zheng moru wochao"* (Kangxi flourishing age and the emperor's minds: discussion on the *"zigu de tianxia zhi zheng moru wochao"*). Beijing: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2015.

Zheng Ning. "Qingchu Jiangnan de baqizhufang yu difang yingdui: yi hangzhou manying jianshe wei zhongxin" (Eight Banners' garrison and local response in Jiangnan area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uzhou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 2019.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Eight Banners' Garrison in Hanzho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QU Cheng（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qchengqs@163.com）

Abstract: Hanzhong was a strategic crossing point between Sichuan and Shaanxi provinces during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The Qing government had twice set up Eight Banner Garrisons during the Shunzhi and Kangxi reigns.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the end of the hostilities, difficulty of the transport and supply,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bannermen and the local populace, and the prevention of Sinicization, the garrison in Hanzhong was finally withdrawn. During the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s, the Qing government once again proposed establishing a garrison in Hanzhong to provide for the livelihood of bannermen. However, because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at war with the Dzunggars, the plan was scrapp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moval of the Hanzhong Garrison indicated that the garrison system was still being adjusted stage before Qianlong reign. The removal of the Hanzhong Garrison also showed that the Qing dynasty had shifted the focus of Eight Banner garrisons from the interior to the frontier and relected the change of national political geography during the process of unification.

Keywords: Hanzhong, Eight Banners' garrisons, Sinicization, livelihoods of Eight Banners, garrison pattern